

文化中国行 27° 黔贵 视线

500多年前，明代大儒王阳明谪居贵州修文龙场，于困顿中悟道，于蛮荒中开讲，以“知行合一”“致良知”照亮了一个时代的精神天空。

500多年后，黔贵大地的山川村落间，那段历史并未隐入烟尘，而是化作乡风民俗、村规民约、书院遗址，悄然生长于一方方寻常乡土中。

暮春4月，龙场驿古道上，石阶苔痕斑驳。在贵阳市修文县举行的“乡愁印迹——贵州村史村事文化传播活动之探访阳明足迹”活动上，来自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陆续走进天生桥村、幸福村、王阳明纪念馆等地，探访先贤行迹，品读经典诗文。

500多年前龙场悟道留下的文化基因，以或显或隐的方式，深深嵌入十余个贵州村落的肌理中。

“探访阳明足迹，不只是为了回望历史，更是为了读懂今天。”循着阳明行迹，走进这些山村的日常，探寻追问：知行合一，究竟如何在泥土里扎根？阳明心学如何在新时代焕发出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光芒？



贵阳市修文县王阳明文化园中的王阳明先生雕像。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刘青 摄

先贤问道，山川留印迹

从贵阳驱车沿西北向前行，1小时车程便抵达修文县天生桥村。绿意葱茏的群山中，这座村落静卧于云雾之间。天生桥村，其名就带着几分奇崛气质。村子周边，石桥横亘、古道蜿蜒。

500多年前，王阳明谪居龙场期间曾在此流连，登高揽胜，留下《过天生桥》一诗，记录了眼前景象的震撼，诗中写道：“水光如练落长松，云际天桥隐白虹。辽鹤不来华表烂，仙人一去石桥空。徒闻鹤驾横秋夕，漫说秦鞭到海东。移放长江还济险，可怜虚却万山中。”

4月25日，当浙江大学求是特聘教授、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董平站在天生桥村观景台上远眺时，他不禁感慨：“天生桥是王阳明内心世界与黔贵大地相连的一条精神纽带。正因先生途经此地，他挥笔写下《过天生桥》，让一处自然地标成为传承厚重历史文化的人文精神和文化价值坐标。”

“天生桥不仅是一座自然石桥，更是一座文脉之桥、精神之桥。”贵州大学哲学学院教授、阳明文化转化运用工程学术委员会委员邓国元在探访途中如是说。

修文县龙场街道新春村，正是王阳明悟道之地的核心区域。村子附近的玩易窝，是他当年游学读书之所；距离新春村仅3公里的阳明村，毗邻阳明洞与龙冈书院，是王阳明开坛讲学、广收门徒之处。沿着六广河、阳明古渡、飞龙峡一路寻访，驿泉村所处的六广镇至今保留着明代古渡遗迹，“陆广晓发”的诗意画卷，依稀可见。

“王阳明龙场悟道使贵州成为阳明心学的孕育地，成为阳明心学走向全国和世界的始发点，成为贵州人引以为荣的重要历史文化资源，这是毫无疑问的。但也正是贵州的山川大地和各族人民所组成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促成了阳明心学的诞生。”历史学者范同寿曾写道。

专家指出，在贵州期间，王阳明留下大量诗文，修文县三人坟、蜈蚣桥等地，皆有他游历的记录。而在黔东南州黄平县飞云崖、月潭寺一带，亦是王阳明“兴隆书壁”的题诗之地，东坡村的村史中至今流传着他在此驻足的记载。

历史的足迹，从未真正消失。贵州的山山水水，本身就是一条鲜活的阳明心学脉络。

阳明心学，村史载文脉

如果说山川地貌保留的是王阳明“行”的足迹，那么渗透进乡村治理、民俗教化与日常生活的精神力量，则成为各地村史村事中“知”的基因。

在铜仁市思南县塘头镇穿洞村，有这样一段历史令人动容。据村史记载，该村在明代中后期实行“每五十户为一社，每社必有社学”的乡村教育制度，该制度与王阳明大力倡导的社学推广理念呼应，有着传承王阳明心学思想的厚重根基。

同时，在王阳明再传弟子李渭先行思想的教育影响下，穿洞村群众以行为先，敢行敢试，将心学内核扎根乡土、融

入日常。如今，该村共有企业家12人、博士生3人、硕士研究生38人、本科毕业生423人。一家正风，一地续脉，代代延绵，数百年不曾中断。

在黔东南州，阳明心学的传播还与民族融合的历史深度交织。凯里市炉山镇伟勇村与湘黔古驿道必经之路的杨老驿接壤。王阳明1508年入黔时，经过五里桥、杨老驿一带。1569年，黔中王门另一位核心人物孙应鳌从鄱阳巡抚任上辞归，在此筑“平旦草堂”“学孔精舍”（学孔书院、山甫书院），著书讲学长达5年，培养弟子无数，阳明心学由此传入黔东南苗侗地区，促进了当地民族融合和文化认同。

毗邻伟勇村的炉山镇城关村，是孙应鳌的诞生地，清平卫的历史烟云与阳明文化的传承脉络在此地同样清晰可辨。1508年，王阳明途经清平卫时留有《清平卫即事》一诗，曾道光《清平县志·流寓》更立有“王守仁传”。这座古镇，曾是黔中王门五大重镇之一，书声与论道之声曾在此山谷间久久回荡。

贵州大学阳明学研究中心主任张明认为，龙场悟道是明代中期儒家文化在贵州民族地区大规模传播的一个重要节点，其对促进民族理解与融合、形成中原文化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当时，王阳明还受聘主讲于贵阳文明书院，开启贵州自由讲学之风，使得“士类感慕者云集听讲，居民环而观如堵”，将贵州的书院教育引向巅峰。在王阳明的带动下，其弟子和入黔官员纷纷投身教育，流风所至，各地相继创办了21所书院。

张明说，“这些书院是助推贵州文化教育提升的重要转折点，很多书院至今都还保持着祭祀王阳明的传统，甚至还有专门的王阳明祠堂，这也是对阳明心学的怀念与继承。”

知行合一，新风续薪火

历史的意义，最终要在当下找到落脚点。此次探访阳明足迹的活动，不仅仅是一次文化溯源，更是一次现实观照——500多年前的心学智慧，如何在今天的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中焕发新的力量？

修文县阳明洞街道幸福村给出了生动的现代答案。该村为多民族聚居村寨，历史悠久、民风淳朴，村委会外墙以图文并茂的方式展示着王阳明生平事迹、心学格言与经典故事，“和顺乡邻”“化民成礼”等标语醒目有力。

最引人注目的是，村里专门设立了一间“良知调解室”。这间朴实的房间，承担着村民纠纷调解的功能，调解员不引用法律条文开场，而是先和当事双方谈“良知”，以“致良知”“知行合一”引导村民和睦相处。

董平直言，这间调解室给了他极大的震撼。“人们在这里面对自己的内心，反思自己的言行，改过向善，相互谅解。这充分证明，阳明心学是具有强大生命力的精神财富。”他表示，幸福村的实践启示我们：激活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关键在于实现其精神内核与现代生活实践的水乳交融。

“王阳明龙场悟道后，便修建了龙冈书院传道讲学，周边少数民族学子纷纷前往请教求学，幸福村的先民很可能也曾向先生求教过，阳明文化潜移默化的影响力才沉淀至今。”张明对“良知调解室”的民间调解智慧表达了赞赏，他认为王阳明关于民间治理的经验如今能在幸福村完整地延续下来，这是阳明文化在现实中传承的表现。

在毕节市黔西市素朴镇牛场村，“水西论象”的历史记忆同样在新时代焕发新机。该地的象祠景区，是贵州打造“阳明·问道十二境”中的重要一站，也是他写下千古名篇《象祠记》的诞生地，王阳明在文中以象的故事阐发“人性本善”的观点，认为教化能够改变人的行为。如今，牛场村将这一精神内核转化为乡村文明建设的动力，以文化人、以德润心，村风民风持续向好。

黔山秀水间，先贤已远，但心火长明。当阳明文化成为一代又一代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真实践履，这些散落在黔贵山野间的村落，不仅是贵州村史村事一份珍贵的文化基因，更用自己的方式续写着阳明文化最鲜活的当代篇章。

乡愁印迹 村史村事

大屯土司庄园：民族文化交融的瑰丽诗篇

李党

大屯土司庄园位于贵州省毕节市七星关区大屯乡，是西南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保存得最完好、最具有代表性的彝族土司庄园，是彝族文化与汉族文化相互碰撞、深度融合的恢宏建筑，大屯土司庄园见证了彝族的土司制度演变、反映了历史的沧桑、浓缩了社会变迁。

1988年3月，大屯土司庄园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庄园建筑面积为2600平方米，占地面积5000余平方米。整个建筑群坐东向西，依山而建，逐级升高，略呈长方形。庄园以建筑这种凝固的文化形态，镌刻着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鲜活印记。

彝汉文化交融的见证

据担任过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所长的知名学者，大屯土司庄园统治家族余氏后裔余宏模考证，大屯土司庄园系彝族拉勒部后裔统治家族所建造，是他们统治地方的衙门府邸和生活起居的地方。

据《毕节地区志》记载：“清顺治十六年（1659），奢辰（‘奢安之乱’发动者之一奢崇明之子）潜居于龙场营之卧牛河。康熙年间，奢辰之子将大屯分给第三子张翔置业，下传11代。庄园自张翔后，经乾隆年间杨廷栋增建，道光年间余象仪重建，再经余达父逐年扩建和民国初年加以修葺，始具如今之规模。”

庄园整体布局为中轴非对称的三路建筑，中路建筑有大堂、二堂和正堂；左路有亦园、粮仓（还未恢复重建）、绣楼；右路有轿厅、时园（内有榭雅堂、祠堂、双环鱼池等）。庄园周围砌着围墙，墙外四周筑有6座碉堡（现存4座），可谓戒备森严。

庄园的大门并没有设置在中轴线上，而是在右侧。要进入大门，必须经过长长的石梯，行至石梯中部时，庄园中轴线正前方的围墙上，一个红色图案十分醒目，这是一个红色的万寿福图案。

由于彝族是以虎为图腾的民族，万寿福图案上的4个小钩，代表虎的爪子；3朵小花是大元宝的变形图，代表财富；3条短横线代表天、地、人，外圈是汉文化中如意的图案，彝、汉文化水乳交融，共同表达了吉祥如意的美好祝愿。

大堂矗立在4米多高的石阶上，门楣上悬挂着刻有彝文和汉文“大堂”字样的牌匾。大堂是庄园最雄伟壮观的建筑。大堂檐柱和内柱下均有柱础，柱础上雕刻着火焰的图案，彝族是一个崇尚火的民族；火焰下面是栩栩如生的蝴蝶，而且蝴蝶是倒着的，蝴蝶在汉语中是“福”的谐音，蝴蝶倒着也就是汉文化中“福到”之意。

进入大堂后，穿过石板铺砌的院坝，右侧有一个刻有“时园”两个字的卷拱小门，这两个字为余达父所书，顺门而入，里面的景致让人眼前一亮：一座造型独特的风雨桥横卧在园中，让人仿佛进入了江南园林，风雨桥两边对称的两个鱼池，形如并蒂莲花，被称为双环鱼池，整体造型宛如一个玉如意；想想鱼翔浅底、莲蓬青青的场景，那是怎样一幅美丽的江南画卷！双环鱼池的护栏上刻着虎纹的图案，风雨桥的正前方是祠堂，是扯勒后裔裔（余）氏家支主人供奉祖先的地方。在时园，江南园林的秀美风光与彝族文化悄然交融，让人感受到一种陌生而又强大的文化张力。

庄园里飘动的书香

行走在大屯土司庄园，总会感到眼前仿佛出现庄园历代主人潜心攻读的身影。赤水河两岸的川黔两省地带，在明朝时属于永宁宣抚使辖地。明洪武中期，宣抚使奢阿兹卒，奢奢袭其职。奢奢重视儒学教化，科举制度也在这片区域推广开来。

在大屯土司庄园，书香最浓郁的地方当数亦园（东花园）和时园（西花园）中的榭雅堂。亦园是庄园主人家学学堂，为庄园第九世主人余珍在清同治年间始建。亦园的门上、窗上除雕刻着虎纹、祥云、蝴蝶等图案外，还伴有“花中四君子”——竹、菊、兰、梅的醒目图案。

这样的家学氛围成就了“余氏一门五诗人”的文坛佳话——大屯土司庄园第八世主人余家驹（1801—1850），是受汉文化影响积极参加科举考试的彝族知识分子代表。余家驹参加科举考试获得贡生的功名后，归隐山林侍奉母亲，同时潜心创作了大量诗作，留下了《时园诗草》二卷，他笔下的乌蒙山区气象万千，民族文化多姿多彩。

余家驹的儿子、大屯土司庄园第九世主人余珍（1825—1864）能文能武，擅长书法绘画，因坚壁清野有功，授授武翼都尉。余珍40年的人生中，著有《四余诗草》传世，其中《大方城怀古》《层台驿》等被列入地方志文艺类，广为流传。

余家驹的侄儿余昭（1827—1890），出生在四川省泸州市叙永县水潦乡，他自幼丧父，伯父余家驹对其特别钟爱，把他带到大屯土司庄园传授家学，成年后参加科举考试，受钦赐花翎直隶州知州，为候补知府。余昭一生著述颇丰，著有《土司源流考》一卷、《德斋杂著》一卷、《大山诗草》三卷等。

余氏一门五诗人中唯一的女性是余昭的夫人安履贞（1824—1880）。安履贞受大屯土司庄园家学影响颇深。她19岁与余昭成婚后，夫妻琴瑟和鸣、相得益彰。安履贞的诗稿由余昭编辑刻印《园林阁遗草》传世。她是活跃在那个时代的凤毛麟角的贵州女诗人之一。安履贞非常重视教育，儿子余一仪，特别是后来成为大屯土司庄园最著名主人的孙子余若璋，都深受她的影响。

大屯土司庄园第十一世主人余若璋（1869—1934），字达父，是“余氏一门五诗人”中成就最高的一位。他曾留学日本，从事过反清革命活动。回国后，余若璋办过报纸宣传民主法治，并办过律师事务所，出任过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余若璋著述较多，有《碧石精舍文集》四卷、《且兰考》四卷、《榭雅堂诗集》十四卷等。榭雅堂是余若璋的书房兼会客室，是大屯土司庄园内书香最浓郁的地方。余若璋的很多传世之作均在此写就。在榭雅堂内，最令人震撼的是那方横卧在地上、余若璋亲自为自己书写后刻制的墓碑，上书：前清法政科举人、贵州大理分院刑庭庭长、贵州省政府顾问、诗人余榭雅先生之墓，“诗人余榭雅先生之墓”这行字比其他所有的字都大得多，很显然，在所有的头衔中，余若璋最珍视的是“诗人”桂冠。

历史的延续

新中国成立以后，这个家族的成员和后代成为伟大祖国的建设者，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为国家的繁荣富强贡献力量。余达父次女余祥元长期执教讲台，曾当选为织金县人大代表，她退休后工于诗词，著有《抱梅楼诗集》。

大屯土司庄园有一套完整的机构管理、运行体系，庄园内各类人员分工协作、各司其职，他们中包括代写租佃契约告示的师爷、看家护院的团丁以及参与服务的各类工匠。新中国成立以后，他们携技艺离开了庄园，开始新生活。

庄园里有一个师爷叫周尚敏，其妻子也在庄园中当厨师，负责制作各种糕点，尤善制作黄粑。据周尚敏的孙女，现为贵州省人大代表、贵州省劳动模范的周琴回忆，她研发特色系列食品，就是为了传承、弘扬彝族美食文化，这份匠心也和大屯土司庄园有关。周琴年幼的时候，经常到爷爷、奶奶家去，总看到一家人做黄粑的情景：奶奶一丝不苟地选米、选豆，妈妈耐心地淘洗、浸泡，爷爷熟练地生火、上甑。随着袅袅炊烟升起，黄粑的香味弥漫开来，周琴总有一种莫名的激动。后来在奶奶的精心指导下，周琴潜心研究食品制作技艺，推出了以黄粑为代表的系列产品，深受消费者喜爱。2021年12月，周琴被正式认定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

走进大屯土司庄园，如同走入一部彝汉文化碰撞、交融的恢宏史册，置身园内，聆听每一块石头、每一片瓦砾、每一段木枋的述说，寻觅庄园内经年不绝的书香，回望那些让味蕾绽放的庄园美食，仿佛都能感受到历史文脉。

阳明心学在贵州村落的延绵与回响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陈江南